

倒读历史

DAODULISHI

金克木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Jiangsu Publishing Group

1267
569
:5(5)
2007

倒读历史

D A O D U L I S H I

金克木 著
张昌华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倒读历史 / 金克木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7. 1

(大家散文文存)

ISBN 978 - 7 - 5399 - 2433 - 5

I. 倒... II. 金...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60070 号

书 名 倒读历史

著 者 金克木

责任编辑 金 泉

责任校对 碧 海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省高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40 mm 1/32

字 数 250 千

印 张 9.625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99 - 2433 - 5

定 价 20.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辑 一 百年人生

- ■ ■ 百年投影：1898—1997
- ■ ■ 两位母亲
- ■ ■ 三个姐姐
- ■ ■ 二嫂
- ■ ■ 第一个女朋友
- ■ ■ 一点经历
- ■ ■ 文丐生涯
- ■ ■ 译匠天缘
- ■ ■ 末班车
- ■ ■ 老来乐
- ■ ■ 遗憾
- ■ ■ 自撰火化铭

辑 二 佛佛禅禅

- ■ ■ 宗教信仰
- ■ ■ 鸟巢禅师
- ■ ■ 孟加拉香客
- ■ ■ 德里一比丘
- ■ ■ 读书人谈禅不信佛
- ■ ■ 佛教文化之中国化
- ■ ■ 四部最流行的佛经

辑 三 历史谈片

- 101 学史三疑
- 101 倒读历史
- 101 历史的断层
- 101 历史的幽默
- 101 妄谈三皇
- 101 妄谈孔子

辑 四 文化琐议

- 111 如何解说文化
- 121 传统文化·外来文化
- 131 显文化·隐文化
- 141 文化百川汇大都

辑 五 书人茶话

- 151 古今对话:读书
- 151 读书法
- 151 九方皋读书
- 161 读书得间
- 161 读书·读人·读物
- 161 新世纪的书
- 171 “书读完了”

辑 六 闲话实说

- 181 棋外谈棋
- 181 大小猫洞
- 181 筷子 刀叉
- 181 难在第一字

[191] 三教授论蜣螂

[193] 寂寞

[195] 时间

[199] 名人讲演(上)

[201] 名人讲演(下)

[204] 闲话哲学

[207] 闲话天文

辑 七 异文杂谭

[213] 文哲经典多说梦

[215] 坐井观天 也有所得

[217] 反传统的传统

[220] 清文字狱质疑

[221] 子·妻·语法

[224] 爱·情·真·幻

[227] 匡衡·刘向·杜甫

[229] 独白·对话·画外音

[232] 记号·信号·符号·象征

[234] 什么是弧三角

[237] 八俊图引

[241] 畅春园康熙夜读书

[244] 陈寅恪遗札后记

辑 八 缅怀落叶

[251] 刘教授文典

[254] 忘了的名人

[257] 敬悼俞平伯

[259] 纪念向达

- 264 徐祖正教授
- 266 何容教授
- 269 少年徐迟
- 271 保险朋友
- 295 人世流星
- 299 代沟的底层
- 300 三笑记
- 301 编后琐言



辑 一

百年人生

金克木的老年、青年

百年投影：1898—1997

几十年前我听到两位朋友谈论中医西医。

一个说：我承认中医西医都能治好病，但是西医说的道理我懂，中医说的阴阳五行那一套我不懂，我只能相信我能懂的。

另一个说：能治好病就是好医生。你何必管他讲的是什么道理？治不好病，讲道理没用。

这一位是实践论者。

那一个说：我死在西医手里，死个明白；死在中医手里，死得糊涂。

这一位是理智主义者。坚持要问为什么。

另一个说：死都死了，什么都不知道，明白和糊涂还不是一样？我是凡人，不是智者。

这一位是唯物主义者吧？

依我看，求明白的人不是没有糊涂的地方，反空谈的人也不是处处不讲道理。只不过是两种人所向往的和所奉行的不一样，便成为两种仿佛截然不同的思想，以致讲出很有分别的话了。究其实，智者本是凡人。凡人有平凡的智慧，或者说是通晓世故人情。智者可以有凡人达不到的精神境界，但凡人会生活得更好。智者和凡人的界限难分。

我把自己的一些创作的新诗，翻译的外国诗，后来写的一些谈论文化的文章，合起来一看，明显表现了自己的三个时期，也折射出了一百年来的三个时代。因为我本是大时代中的小人物，不能不在思想感情上经历并且透露出时代的气息。我好像是想当智者的凡人。

我有这样两行诗句：

儿童的人间：做梦，做诗。

少壮的人间：苦斗，沉思。

做梦的是诗人。苦斗的是凡人。沉思的是智者。人人都可以有这三种境界，做这样三种人，因为三者看似隔绝，其实通连。正像我那两位老朋友当年论医一样。他们尽管意思不同，还是可以对话，争论，正是因为彼此相知，有通连的共同之点。然而虽有相同，却又相异。年长者都多少走过中国和世界这一百年来所走的道路，儿童和少年还正在走下一个一百年的道路，但是每人又各有不同。可能经历类似而感受和理解不会完全相同，甚至会完全不同。

有个故事说，有两个记者同去采访一条新修铁路的沿线情况。两人分属两家报社，都想有独家报导，所以上火车后各自坐在车一边，互不交换位置，也不交谈见闻。随后两人各写出一篇通讯发表。一家报纸上说这条铁路沿线是崇山峻岭非常壮观。另一家报纸上说火车一路上沿着河流行驶风景秀丽。原来这条铁路是依山傍水而行，两边景色不同。两人写的都是真实报道，不过只看一份报纸的读者就只知道一边了。

我所见的只能是百年来道路一边的星星点点，但我的感受是在这一路上的真实感受。我说的是感受，不是见闻。恐怕很少人有像我所经历的这样的环境变化，因而感受也不会一样。但时代的脉搏是共同的，所以我以为会有人感我所感和想我所想，我写出的诗文还会有读者。于是我写了这样一些作品，给后来的人看。

我出生于辛亥革命的次年。出生后不久就碰上“抄家”。再过几个月，父亲就突然离开世界，把我抛给我的不识字又不懂事的二十二岁的母亲，要她在铁和血的世界中，在冷漠的旧式家庭中，把我养大。我不知不觉经历了中国“光复”的一场大革命。不留辫子了，但还要磕头。

识字了，读书了，看到了父亲和祖父和曾祖父留给我的堆在空房子里的一箱又一箱旧书。一类是八股文和有关的书，我不懂。有木刻原版的《学津讨原》丛书，不完全，仍旧很多，我也看不懂。还有许多“戊戌维新”前后出的新书。石印小字本是上海出版的。铅印大字本是在日本横滨印的，其中有梁任公（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和他主编的《新民丛报》的许多合订本。我最先看得懂的就是梁任公的那些小说、戏曲（传奇）、传记、诗话、杂文。于是我又在不知不觉之间进入了我父亲的时代，背上了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前一次革命“戊戌维新”失败的沉重压力。

“戊戌”（1898）和“辛亥”（1911）这两次革命都是失败的。其成功之处只是改了教育制度和没有了皇帝。两次提出的理想都没有实现。中国照旧是又穷又弱，军阀官僚土豪劣绅照旧横行，洋人依然称霸。

我上小学时正赶上“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过去，读到了第一批用白话文的小学课本。小学毕业后读到了《新青年》的合订本五大卷。这时可比读《新民丛报》懂得多了。可是书里面提出的理想并没有实现。“新文化”的高潮已过，“五四”前后作为文化的革命，除在语言文学上有进展，在婚姻制度上有“自由恋爱”的强烈的冲击波以外，仍然是失败了。我的周围依然未变。可是更大的革命来了——革命军“北伐”。不过伐到长江以北，到了我们那里，这次大革命又夭折了，比“戊戌”、“辛亥”、“五四”更惨，规模更大，斗争更激烈，死的人更多。

我十六岁刚满，名为十七岁，便去乡间教小学。半年后去外地一处中学闹“学潮”。学生被捕，学校关门，我又去邻县乡间教了一年小学。这两年的中学生和小学教员生活使我见到了也认识了不少的新人，知道了而且经历了不少新事。我听到了广州、武汉、上海的革命的涨潮和退潮，而且和黄埔军校毕业战斗归来的人结交，和中山大学、上海大学、武汉“干部学校”的学生在一校同事，还见到各种各样的男女革命者。我不由自主又背上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沉重精神包袱。

我背负着“戊戌”、“辛亥”、“五四”、“北伐”四次革命失败的思想感情负担。在 1930 年，我刚满十八岁，经过上海，由海道到了“故都”北平，也就是北京。

仅仅过了一年，就来了震动全国以至世界的“九·一八”。日本侵略者公然占领我们的东三省，要先吞并“满蒙”，进而吞并中国。这比“八国联军”严重得多，真要亡国了，我们要做“亡国奴”了。从北到南掀起了全国要求抗日的大风潮。几个月后，1932 年“一·二八”上海的日本军队又动手了。但和在东北不同，他们遭到了抵抗。吴淞口的炮台吼起来了，开炮打日本军舰。十九路军对日作战。日本飞机炸了商务印书馆和附设的东方图书馆。北边黑龙江也有中国军队抵抗日军。抗日义勇军在东北日军铁蹄下组织起来。然而所有这一切很快又成为过去。烽烟都息了，只剩下江西的内战的炮火越打越激烈。又一次革命退潮了。“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仿佛注定还得做奴隶。

我不参与运动，但见闻很多。这次我虽然亲身经历，也还是和以前的四次革命差不多，感受多而行动少。前两次只是精神经历，因为“戊戌”在我出生前，“辛亥”后一年我才到世界来。然而五次不同的革命的失败氛围给我的精神重压是摆脱不掉了。

1932 年冬天，我由友人介绍到山东一所县立初级师范讲习所当教员。一到就碰上学校闹“风潮”。我住进校内而有职无业。那位朋友忽然临时去省城。我既无走的路费，又无住下的饭钱。在黯淡的煤油灯光下，我提笔写出了诗《秋思》。随后又连写了几首都寄给北平（北京）的友人，其中有一位是写新诗谈文学的。友人来信说：“诗可以发表了。你不寄，我们替你寄。”结果是几首诗在当时唯一能继续出版的大型文学杂志《现代》上刊登了出来。于是我继续写诗，有些发表了，有的留在手头。到 1936 年初编成了一本《蝙蝠集》出版。我写诗本不为发表，也不是和哪位诗友争胜，更不是有什么忧国忧民的大志要借诗表达，又说不上是借诗发个人小牢骚，当然不会是职业的要求，不过是有时想记下一点个人的感受，也多少想对新诗体做一点试验。无奈渺小的个人也脱离不了

大时代的氛围，我又在无意中背负了五次革命失败的精神压抑，用艺术形式表达感受时就不能不由小通大，由今通昔，并且由个人见时代了。至于诗的好坏，读者会看出什么，那就非我所知了。

随后是“七七”抗战，1939年欧战，1941年德国攻苏联，日本打美国。

以上是说明我的作品的第一部分，新诗，也是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的背景材料。我相信，读这些诗时连上或者不连上从1898年“戊戌”经过“辛亥”、“五四”、“北伐”、“九·一八”、“七七”到1941年世界大战中间的革命失败和胜利的情绪，这两种读法是可能大不一样的。当然，这里只有诗，不是历史评说，表达的是个人感受，不是议论。

我的作品的第二部分是译诗，是从梵语原文译成汉语现代白话的印度古诗。只有最后一首《控诉》是从巴基斯坦定为“国语”的乌尔都语原文译出来的。作者伊克巴尔逝世在印巴分治以前，他的诗也可以说是属于历史上的印度，和前面的诗一样，都是古诗。诗题的本意是“埋怨”、“诉苦”。从诗体和内容可以感受到伊斯兰教徒的激情，和前面的婆罗门教（印度教）和佛教的诗正好对照，但这些情绪并非只属于一个教派或种族。译出的诗尽量依照原来的体裁和语言，所以各不相同，和自己作的诗又不一样。

这些过去时代的印度的诗怎么能算做表现我从1939年到1979年这四十年间的一个时期呢？

这四十年正是我从青年到老年的时期。大的历史背景不必复述，大家都知道。我的经历，主要指精神的，则可以套用一位前辈讲史学的一句话：

走南闯北找东西。

我找的是东和西，就是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期欧洲人一般说的东方和西方，不是更早或更晚的说法。单就读书说，我从拉丁文、罗马史读到梵语经典、汉译佛典，再到《联共（布）党史》的中外

文本，到学习俄文。然后是十年不读任何书。最后是又开始看到我几乎看不懂的外国新刊物和书本。可说是兜了一个大圈子，但回到的已经不是原地了。

我找到了什么？什么也没有找到。

这几十年中，我只有别人，没有自己，所以只好用译诗来表示。我翻译不是由于那是名作要介绍，而是由于我估计自己可以做翻译这首诗的试验。所以译的虽是别人的，译出来却也有我自己在内。因此可以说也表现了我。

我的作品的第一部分如果说是可以由今见昔，那么，第二部分可以说是由昔见今，由人见我。

我怎么会去找东和西？

1938年我在香港住了将近一年，多少尝到了一点大英帝国统治的滋味。1939年我准备探寻由罗马帝国上溯古希腊的路程。1941年我到缅甸的仰光暂住，看到大英帝国的这一部分不像香港，也不是上海英租界的扩大。随即到了印度。英吉利王国正是因为女王维多利亚加冕兼任印度帝国女皇而成为帝国。这里又和缅甸不同，也和中国大不一样。我感到惊异的是，英国是一个岛国，怎么能统治地球上插英国旗的这么多大小地方的比自己多出十倍以上的人口？

我惊异地发现，岛国的英吉利统治遍及世界各洲，建立帝国的有些方式居然像大陆上闭关自大的历时几千年直到满清的帝国。不仅是几乎公认的英国的文官考试制度是从中国的科举学去，先试用于印度，然后用到本国，成为行之有效的培养政治人才或官吏的制度，而且连吞并印度的方式也像中国的“禅让”或“改朝换代”。英国解散了“横征暴敛”激起印度众怒的东印度公司，处死了罪魁祸首克莱武并没收其掠夺来的财产，废黜了虚有其名的末代皇帝，送他去缅甸作诗，由英女皇兼任印度女皇。名义上，印度帝国照旧存在，不过是一个自称是蒙古人后裔的莫卧儿皇帝换了一个英吉利女皇。政权暗转到外国。从此“天下太平”。英国人官吏很少。政府只在全国很少的要地设立驻军区，驻扎很少的英国

兵，而把招募的印度兵分驻离本籍很远的语言不通的外地。这仿佛是“八旗驻兵”的老套。对本地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一概不动，又仿佛是满清入关时的政策，只是没有要求男人留辫子，不留就杀，“留发不留头”。还照中国办法开考试做官之路，并且立即分别在东、西、南三处设立大学区，但不办小学。宣布英语为政府的官方语言以代替原来用的波斯语，但保留本土的“官话”，即波斯语化的印度通行语乌尔都语，而又提倡印度各地的不同的文学语言，包括北方通行语印地语。这一套文化教育政策才是大不列颠帝国的一大发明，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才。正如麦考莱在英国议会中扬扬得意宣布的：人是本地人，但说英国话，照英国规矩办事。这和大清帝国不同，但又一致，只是化无序为有序，变政策为制度而已。我和印度一些有识之士谈话并看到甘地等人的著作时，发现他们已经知道了，但已为时太晚。“全面学习”一种外语及文化尽管正式实行不过一百年，也无法退位让仍在千年传统中的各地不同语言来代替这种从外国来的现代语言了。幸而清朝没有也不可能实行这一项语言文化政策，汉人才可以“光复”旧国。实际上这只是把皇族关闭进了紫禁城称王，当总统和总理的几代都还是原先清朝的大臣。

原来大英帝国是大清帝国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多少倍的学生，并不是仅仅遥接罗马帝国。英国初由东印度公司出面派舰队到中国来求通商时正赶上明末清初(1637)。他们在澳门由于无知而上当碰了钉子，但仍行贿收买得到了不少中国货，包括搪瓷器和丝绸，并回本国报告。印度平定以后，英国有准备地派了东印度公司的代表团前来向乾隆皇帝补贺八大庆。使臣到了北京，还去避暑山庄“觐见”了乾隆皇帝。由于只屈一膝不肯双膝下跪“叩首”而受到“龙颜大怒”被驱逐，但不是“无功而返”。这一次不但摸出了中国军力的虚实，还学到了据说有二十几种中国技术，带回了极有价值的英帝国观点的“大清”国情报告。这是1793年，离1840年的鸦片战争不到五十年。中国人上上下下居然对这一严重情况一无所知。到现在也不知有没有中国人研究据说英国早已公开的

东印度公司及其关于东方的档案。十八世纪末英国已经进入当时的“信息时代”了，而“英明天子”乾隆皇帝还在“十大武功”中满足于自己对国外世界聋盲无知的幸福。老百姓更不用说了。一旦发现到外国什么“旧金山”、“新金山”可以发财，便成为“猪仔”被卖了。

此外还有使我更为惊奇而且迷惑的。一接触到印度的书和人和语言的实际，便发现和我原先从中外古今书和人得来的知识对不上号，很难核实。有的简直是不知怎么辨别谁是谁非。也许还是我的眼睛耳朵以至心理有毛病？但有一点我明白。外国人从前所谓“汉学”着重研究的是中国与外国、汉族和非汉族之间的关系。这是他们所擅长的多种民族语文资料对照研究。对于汉语古文献的内容甚至语文含意，他们不注意也无成就。欧洲人对印度似乎稍好一点，因为语言比汉语较为容易相通，还能够拟出一个印欧语系，但对思想文化内容仍然“隔教”，往往是“格义”甚至杜撰。将“汉学”和“印度学”一比，我发现彼此只怕有共同的毛病，只是程度有别。特别是对于文学的作品和理论。我不知道中国的和印度的文献怎么能换成欧洲语言而不会大走样。中印彼此也几乎无法交流通气。尽管有那么多的汉译佛典，往往只能是“望文生义”，“教外别传”。真正通晓内容实情的只怕是只有一个玄奘。他只译不作，一句话不留下。“奉诏”的著作《西域记》是“译”出材料，由别人“撰写”文章。对“哲学”思想的理解比对文学作品欣赏也不见得容易些。我略为接触便发生了迷惑，以致对于“文艺复兴”以后才搜罗整理出来的古希腊、古罗马文献也怕是和汉代整理传下来的先秦文献以及现代整理的古印度文献有类似情况。为什么明明有个大哲人、大师苏格拉底被古希腊法庭判为引导青年误入歧途有罪而受刑被毒死，而在讲古希腊的高超文明时差不多都“一笔带过”呢？对印度和中国又是怎样？

以上说明了我在这四十年左右的“中年”时光中仅仅“走南”又“闯北”，见识了“东”和“西”而没有得到任何东西，所以只有以译出的一些诗留作印迹。